

# 论《富贵源头》的因果报应及社会意义

陈业东

## 一

中国的笔记小说发源甚早，魏晋以降，发展不辍，而作风亦数变。就其内容而论，大略可分为谈神鬼怪异的志怪小说和记录现实人物琐闻轶事的志人小说两类。关于志人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民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识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均为人间言动。”清人笔记小说数量颇多，流传亦广。《阅微草堂笔记》、《香树笔记》、《春在堂随笔》、《嘯亭杂录》等都是上乘作品。

晚清著名思想家郑观应在撰写大量政论散文和优国新诗的同时，也写过不少笔记小说。先有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印行的《陶斋志果》，后有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出版的《富贵源头》。

太平天国战争后，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然灾害频仍，对经济的打击更是雪上加霜。1876年至1879年间，南北各省分别遭受严重的水灾和旱灾，死亡至少一千万人以上，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郑观应在《救时揭要》的《论救水灾》篇中，对当时水灾的祸害有清楚的记载：“呜呼，兵戈未息，水患频兴。或两广常被水灾，或长江时罹水患，黄河水决，清水潭崩，哀鸿遍野，惨不可言。去年，直隶春夏之间阴雨连绵，数月不止，河水盛涨，崩堤决口，地之被水者数郡。吴桥、宁津、南皮与天津境内之房屋，为水冲倒者不可胜计，百姓之露宿於野者

不下八、九万人。若总直隶一省计之，则损坏之田庐等物，所值奚止千百万？而民生之颠沛流离无所栖止者，又奚止百万人哉？亦云惨矣！“灾情是如此严重，民生是如此悲惨，天下之急公好义者连年发起赈济活动，《富贵源头》便应运而生。

关于这本书编撰的缘起，郑观应在《自序》中说：“古今四大部洲，世家巨族富贵绵延，无不由祖先之阴德，以致代有伟人。而阴德之最大、报应之最速者，莫如荒年施赈，一举可活千万人。上契天心，下全民命。古云：‘活千人者后必昌’，洵不诬也。考诸记载，有因活饥民而及身富贵者；有因活饥民而子子孙孙科甲、累代簪缨者，自古及今，不可胜数。盖德愈积，福愈大，不求果报，不求人知。天之报施，愈觉其丝毫不爽。爰选录救荒福报数十则，皆确有可据，请沈小园中翰鉴定，名曰《富贵源头》俾资观感。当此直、豫、秦、晋数百年来未有之奇灾，正祸福消长之秋，国家发帑截漕，士庶捐资助赈，皆趁此机缘耳。”

《富贵源头》出版后，迅即脍炙人口、影响甚巨。自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至民国二年（1913年）三十余年间，每逢赈务，即有善心人重刊是书分送，以为推动。各版作序者亦对此书推崇备至，有称读后“果足激发善心，为劝赈之左券”者；有赞“此书之有功於赈务，实非浅鲜”者；

也有谓“赈款之集，皆是书之刻有以致之”者。

《富贵源头》亦因此成为研究郑观应慈善思想的重要材料之一。

《富贵源头》内辑由汉代至清代救荒福报故事凡九十九则。按主角身份分，计官吏四十则、绅富二十四则、士庶二十七则、妇女六则、方外二则。郑观应说这些故事“皆确有可据”，但考虑到其时代跨度较大，所据书籍必繁，要对这近百则故事溯源求证，一时难以做到。故以下仅就《富贵源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及社会意义进行简单的讨论。

## 二

笔记的性质是随笔杂记，格式本来就没有严格的限制。《富贵源头》所记乃时间轶事，近乎四库全书的杂事类。内中故事人物、情节、环境各要素俱备，将之归为笔记小说是没有问题的。它和郑观应的另一笔记小说《陶齐志果》一样，具有观点明确、语言通俗易懂、简练明快的特色。而最大的共通点，在于两书内容皆以因果报应唤醒世人，达到的惩恶劝善的目的。只不过《陶齐志果》涉及的范围较广，而《宝贵源头》则集中在“施赈获报”罢了。

小说题作《富贵源头》，清楚地揭示了作者的观点：为善是富贵的源头，欲想富贵，必先行善，行善是因，富贵是果。因此，因果报应的观念贯穿全书，而行善一得善报也成为全书一个定型的钗①事模式。归结书中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士行善的方式，约有如下几类：或官式矫制冒罪发赈、或出已俸救灾、或鬻业罄家活饥民、或收养弃婴、或焚债券等等。而善报的结果则包括：登上寿、中科举、升官、得子、痼疾、免祸、子孙富贵等等。

“行善一得善报”叙事模式在书中反复出现，强调因果报应的说教也难免削弱作品的可读性，但作者还是通过一些文学手段去表达题旨。有些篇章不只以记事为目的，而能通过记事以描写人的情绪感受，因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有些篇章用比较对照的手法，显示人物品格的高下优

劣；有些篇章则加上评论或引用诗句以深化主题。

例如《散赈改相》：

太原布商刘全顺，求袁柳庄相面。袁一见惊曰：“兄大限只在一月内，可飞速回家办后事。”柳庄，神相也，言无不中。因自归寓，惘然不乐。表侄周鳌问故始知，因劝云：“今大荒歉，人相食，何不捐资买米麦散诸贫人？积大阴德，或者可回造化！”刘即依言，星夜发银办米散赈。过一月余无恙，复往见。柳庄又大惊曰：“尔作何大阴德？满面阴鹭纹，非但延寿，且可得二贵子。”刘后年八十五，生二子，皆登甲榜，子孙科第不绝。

篇中描写刘全顺的“惘然不乐”与神相袁柳庄前后两次“大惊”都很准备传神。

《富贵源头》亦间以《阻赈恶报》、《闭赈被戕》之类的故事，与众多救荒福报的事例作对照，突出行善有福的主题。甚至在同一篇故事内，作者也有意安排正反面（善与恶）人物出现在同一场合，以“一流芳一遗臭”的结局作鲜明的对照，给读者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如《善恶巧值》：

青浦东郊徐泾镇赵省齐，遇乾隆甲戌岁荒，尽出家资以救饥户，妻彭氏尽变妆奁办米施粥。时粥厂中司赈闵某，侵蚀钱米以肥家。后乾隆乙卯，省齐之孙讳文桂，号香林，名登乡榜，回里拜谒县尊。适逢闵姓之孙因事堂断收监，恰於大堂皆下相遇。一则乘舆飞进，一则带枷拖出，两相值并两相讶云。善报恶报，两两相形，天殆故使之巧相植，以醒世与。

《富贵源头》还有部分篇章模仿聊斋笔法，在篇末加上评论，加强劝善惩恶的效果。如《闭赈被戕》末云：“此虽盗贼之行，终归梟獍，然亦足为不务恤赈之戒矣。”《阻赈恶报》写了宋代林机阻赈，结果自己病卒，三子继亡，其后遂绝。作者评曰：“呜呼，万姓生灵，林以一言杀之，立遭天遣，可不畏哉！”《同胞三鼎甲》写昆山徐族请赈灾，活数百万人，其三孙先后举状元、探花、篇末评曰：“同胞三鼎甲，为熙朝之瑞事，为从古所罕闻。由此以观，则知种福之道，莫有

大於賑飢，即莫有捷於賑餓者也。“《杨杲》篇后之评语最长，谓：“可见为商为贾之人，若能留心积善，随地可种大福。盖钱财是命中一定之物，分中有财，能舍以积德，上天必千倍万倍加利还之。分中无财，即使用尽心机，成家立业，而天地降罚，飞灾横祸，不难夺之而去。或为不孝子败去，留不美之名与人作笑柄。所谓小人枉自为小人，深可惜也。”《许允》篇末则借文帝乱谕诗强调劝善惩恶的题旨：“救人性命功尤大，岁歉宜存济众心。许氏賑飢甘竭产，罗家闭糶不容情。积财能散天加禄，为富不仁天降侵。一死一荣分祸福，苍苍造化意何深”。

这些评论和诗歌，与所述故事配合无缝、相得益彰，既有助点明和深化题旨，又为这本强调因果报应说教的通俗读物增加了可读性。

### 三

谈过了《富贵源头》中因果报应的种种表现之后，接下来讨论：如何看待，《富贵源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这种作品的出现有何社会意义？

我们认为，小说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并非洪水猛兽，《富贵源头》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郑观应辑撰是书，从动机看，目的在於劝賑，而非宣扬因果报应观念，因此谈因果未必就是导人迷信；从效果看，《富贵源头》在三十余年间被一再重印，在历次賑灾中产生积极影响，证明它为弘扬民族优良传统、维护社会与民生的安定起过良好的作用。

因果报应意识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积淀已久，上古典籍中就记载著一些鬼魂复仇的故事。魏晋时佛教传播，其因果轮回之说与鬼魂报应意识相融合，为当时及后世志怪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随著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增加，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因果报应，已渐渐脱离了单纯的鬼魂报应和因果报应观念，强调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以消除百姓的抗争思想；普通百姓相信因果报应，则是希望通过“善有善报”来满足惩恶劝善的愿望。据此，我们确是不宜把文学作品中的因果报应一概斥之为宣扬封建迷信的。

对《富贵源头》表现出来的善恶观，同样不应与宗教的善恶观混为一谈。虽然两者在善恶报应这点上存在相通之处，但《富贵源头》更多的是强调伦理方面的“善”。内里有一篇题为《经忏不如施舍》的，说嘉庆年间，李文壁广延僧道，修醮拜忏超渡亡父。其父冯孙女语文璧云：“尔固孝我，但当此荒年，有些钱财，何不施济饥寒，较为有益。延酒肉僧道礼拜经忏，非但於我无补，更加你我罪衍。若肯施济贫穷，功德比经忏胜百倍也。”文璧即从命施賑。不久，其父又凭孙女语文璧云：“尔之孝思已动幽冥，冥府已加增福寿，我今已往生宝贵人家去矣。”故事中虽有佛教轮回往生情节，但作者显然更强调要施济贫穷。他并非刻意引导读者听从上天的安排，向佛作真诚的忏悔，反而指出“施济贫穷，功德比经忏胜百倍”。可见《富贵源头》所弘扬的“善”，其真意是：恶念不生、众善奉行。虽然它采用了“行善一得善报”的叙事模式，但其思想意义实质上已超越了佛家的果报观念。故而可以认定，《富贵源头》不是一本宣扬迷信的“报应之书”，而是一本唤醒世人的“劝善之书”。

设若《富贵源头》仅是一本“劝善之书”，那它还不具多大的价值。然而，它的出现却含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细心探讨。

如所周知，文学作品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使命。《富贵源头》是郑观应为劝賑而编撰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在以农业主体的社会里，每遇旱涝之灾，广大百姓皆受打击，往往哀鸿遍野、十室九空。除由朝廷发賑外，民间自发的拯患救灾活动，亦蔚成风气，成为传统。

《富贵源头》所辑救荒福报事倒，涵盖自汉至清各朝，绵延千余年，对不同朝代的社会世情都有涉猎。它以近百则的事例向读者表明，官绅士庶妇人虽则所处时代不同、地位各异，但救灾恤邻之心则一。故此书除了是一本“劝善之书”外，还是一本反映社会现实的“世情之书”，更是一曲炎黄子孙优良民族性的颂歌。

《富贵源头》的故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蕴，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长生富贵的愿望。古人对硕大

的宇宙深怀敬畏，常常感伤人生短暂渺小。《自诗十九首》中“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之类的咏叹，就是这种生命忧患意识的表现。千百年来，从君主到百姓都企图摆脱生死这一自然规律的制约。或入山修炼，或食石服药，或沉迷宗教，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长命永寿。渴望长生富贵本质上已成为一种群体意识，一种蕴涵丰富的民族文化心理。《富贵源头》正好为追求长寿富贵的人指明了一条通向彼岸的捷径：只要赈灾行善，则长寿、富贵、得嗣、免祸、愈疾等等福报就在眼前！每个故事似乎都在告诉读者，那霞彩斑斓、百花吐艳、紫气氤氲的美景就在身边，行善者伸手可触，举步即及！想想，这该有多大的诱惑啊！坦率点说，《富贵源头》只是因果报应思想简单的图解，作为笔记小说，郑观应也不曾在艺术技巧方面下大功夫，甚可读性有限。出版后所以广受欢迎，在历次赈灾活动中发军巨大的影响力，归根究底，就是於它能满足人们追求长生富贵的愿望。

郑观应是虔诚的道教徒，一生学道不辍。翁同苏为他的《罗浮待鹤山人诗草》作序时说：“特神仙家支派有二：有持厌世主义而仅为自了汉者，有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者。如前之说，其人虽仙，无裨於世，是方技家而非宗教家也；如后之说，大都由任侠而入於神仙者。从不即仙，而抱此高尚纯洁之理想，或见之於行事，或著之於寓言，其足以感发当世之心思，而变化其气质者不少矣。”郑观应就是一个“持救世主义而自度度人者”，他曾表示“欲求点铁成金术，普救灾黎四海清”（《敬步吕祖师呈钟离祖师原韵》），希望通过道术而度人济世。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在道教。事实上，道教思想几乎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的每一角。编撰《富贵源头》劝赈无疑是郑观应度人济世的一个大动作，其根源之一就是宣扬羽化飞升、长生不老的道家思想。

《富贵源头》所记故事，主角属於社会不同阶层：官吏、绅富、士庶、妇女乃至方外人士。涵盖面如此之广，作者明显在向读者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善事人人可为，决无富贵贫贱之分。沈高齡所写的《跋》对此作了解释：“明知好善者不过行其不忍之仁心，而未尝冀富贵之报。而天之

所以富贵之者，亦即视其不忍之仁心，而如量以予之也。譬水之有源头也，其源不竭，其量自宏。则既富贵者正宜于此时栽培善果，而富贵自可世守而勿衰。未富贵者亦当于此时耕种福田，而富贵亦可不度而自至也。”书后所附一篇《劝赈文》也围绕这一点作了清晰的绅申，文曰：“有财有势者积德易，易而不为，是自暴也；易而乐为，是锦上添花也。贫贱积德难，难而不为，是自弃也；难而肯为，则一善可当百善矣。如必待有余而后济人，此其人终不能不为善矣，必愈多而愈贪矣。”《富贵源头》传递的“人人皆可行善、人人皆可获报”的信息，无疑大大地扩展了它的读者层面，其社会效应也就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除《劝赈文》外，书末尚附有《劝孝文》和《救灾文》各一篇。在源远流长的我国文化史上，此类劝世文章不知凡几。虽然它们也曾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产生过影响，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通俗小说的读者群更广，实际产生的影响要比传统的经史诗文大得多。究其原因，就在于通俗小说以情节和形象去感动读者，一如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所说，读通俗小说可“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与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谗妄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於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郑观应仅把《劝赈文》、《劝孝文》和《救灾文》附於《富贵源头》的篇末，看来，他是非常了解小说的影响力胜於经史诗文的道理的。

总括来说，《富贵源头》的艺术成就虽不算高，但它蕴含的社会意义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书中的因果报应观念或带有一些消极因素，但就作品整体思想倾向来说，决不是腐朽落后的。在《富贵源头》面世后一百二十多年的今天，人们在赈灾劝募时，不是依然应许善长仁翁会“种善因、得善果”、“福有攸归”吗？试问，有谁会在慷慨解囊、踊跃捐输的同时，质疑劝捐者的许诺能否兑现，或者指责劝捐者是在宣扬封建迷信思想呢？（《富贵源头》一书由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提供，谨此致谢！

（本文作者单位是澳门大学）